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的学术贡献

周 少 川

黄丕烈，字绍武，一字绍甫，号尧圃、复翁等，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道光五年（1825）。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嘉庆六年大挑一等，为直隶知县，不愿就职，纳资得兵部主事，旋归里从事校书、著述。黄氏的藏书多得自毛氏（毛晋、毛扆）汲古阁、钱氏（钱谦益）绛云楼、王氏（王闻远）孝慈堂等著名藏书家，收藏以既富且精而著称。曾辟“百宋一廛”专室贮所得宋版书一百余种。据统计，其一生所获宋刻书在二百种以上^①。黄氏不仅好藏书，且勤于读书、校书，曾搜集一批古籍善本，精心校勘后刻成《士礼居丛书》，并著有《百宋一廛书录》、《百宋一廛赋注》、《求古居宋本书目》、《所见古书录》等版本目录学著作和大量藏书题跋，后人将其题跋编辑成书的有《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续五卷、再续二卷、补录一卷，《尧圃藏书题识》十卷、续四卷、再续三卷。其中以《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最重要。《题跋记》所记多为宋元旧刻或旧抄，这些古籍是黄氏收藏的精华，所作的题跋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题跋记》的研究，探讨该书在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及书史记载等方面的贡献。

一

《题跋记》的编辑是从清末目录学、校勘学家潘祖荫开始

的，并由他的学生缪荃孙补充、编刻而成。共收题跋三百四十一篇。

《题跋记》内容及其来源，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得自前人目录书。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官修《文渊阁书目》、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黄丕烈运用这些著作中的材料，或引为佐证，或纠其谬误，或由此及彼，推阐大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动了版本目录学的发展。

（二）总结自己的钻研心得。作者在校勘书籍、分析考证中总结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和心得。这些成果来源于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文化修养。他学问渊博，对经、史、小学、天文、舆地、百家、诗词等无不通晓。他将广博的学识集中应用于校书工作和题跋中，并有所创新，因而能留下丰硕的成果。

（三）依靠亲身采访。他说：“己所不知而人知之，学之所以贵乎问也……”^②校书中有疑难，他不耻下问，故题跋中记载了许多从友人、学者询问得来的学识。

《题跋记》所收题跋最早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最晚为道光四年（1824），包括了黄丕烈各个时期的藏书题识，他一生中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书中都有反映。其中除评述书的要旨、版本外，还常常记述收书、藏书的佚闻。

二

《题跋记》的学术价值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版本学的贡献

有关版本学的论述，是全书主要篇幅所在。黄丕烈对宋刻本的鉴别，可称独到。这固然是他潜心钻研文献资料的结果，也更因为他有长期经眼实物的实践。他自称“佞宋”成癖，癖之所成

也就是学识的积累过程，他把这些学识笔之于书，为后学识别宋本指示了途径。

宋刻书避讳甚严，凡属讳字都要缺笔或改字。黄丕烈正是利用宋刻的这一特点，鉴别了一批宋本书。例如卷六跋《东莱先生诗律武库》说：“顷有书坊以旧刻本来，楮墨古雅，余粗阅一过，审为元刻……破几日工校如前，卷中遇‘朗’、‘敦’、‘亘’等讳间避之，乃知宋刻非元刻也。志此以见书之难定如此。”这类事例在《题跋记》中俯拾皆是，其中很多利用宋讳鉴别版本的方法，为后人所借鉴。宋刻讳也有特殊的情况，如卷五跋《浣花集》曰：“此实系宋版，卷中‘徵’、‘禎’、‘玄’、‘树’避此四字；而‘玄’、‘树’有不尽避者，宋版时或有此。”这是在掌握宋刻避讳普遍规律时必须注意到的特殊现象。另外，利用避讳还可以判定版刻先后，区别原刻、翻刻。例如卷三跋《说苑》曰：“仁和孙志祖跋云：晁氏《郡斋读书志》叙《说苑》篇目，避孝宗讳，易‘敬慎’为‘法诫’，而此本不易，以为疑。余谓此疑咸淳本之出孝宗后尔，何亦不避？岂知重刻云者，特翻旧本，故遇‘慎’字间缺末笔。若余所得本，并不避‘慎’字，则刻较先矣。”此跋运用孝宗讳字，区别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宋本《说苑》。

鉴定宋刻本亦可利用板式的宽狭和书口的黑白。如卷二跋《新定续志》云：“启包见板口阔而黑，视之则《新定续志》也，心疑为非宋刻。”“余所藏《中兴馆阁录·续录》中有咸淳时补版，皆似此纸墨款式，间有阔黑口者，可知宋刻书非定白口或细黑口也。”说明宋版中也有部分阔黑口的刻本。又如卷三跋《管子》：“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板宽而口黑，亦小字者。”说明宋刻版式还有板宽的特点。

对于宋本的鉴别，还可通过观察书籍的纸质来确定。如卷三跋《图画见闻》：“爰揭去旧时背纸，见原楮皆罗纹阔簾而横印

者，始信宋刻宋印。”宋代刊书有些是以纸背印行的，黄丕烈鉴识宋本也往往以此为依据。卷五跋《北山小集》中有云：“书友胡益谦持《北山小集》示余，欲一决其为宋版与否。余开卷指示纸背曰：此书宋刻宋印，子不知宋本，独不见其纸为宋时册子乎？”宋时纸张厚实，故两面皆可印刷，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宋代纸张供应不很充足，所以有些书利用旧册籍的背面印制。正如黄丕烈所说的：“宋版书纸背多字迹，盖宋时废纸亦贵也。”^③

除了以上方法外，书中还记述了其它一些鉴识宋本的经验，如卷一《春秋繁露》跋文利用刻书字体判断的方法，卷三《管子》跋、卷四《茅亭客话》跋两文中利用古书木记识别的方法，都为后学提供了范例。

《题跋记》不仅对宋版书的鉴别有独特见解，对其它刻本的鉴识方法也时作论述，这主要是从各时期刻本的自身特点去审辨。对元刻的鉴别，卷二跋《梦华录》总结了元刻“板大而字细”、“不避宋讳”的特点。对铜活字本的识别，则通过常见书坊牌记“会通馆”、“兰雪堂”、“锡山安氏馆”等名目的著录，作为审定的依据。手抄本的鉴别较复杂，卷五跋《小畜集》中记录了两条识别经验：一是留心各家钞书的特点，如书法笔迹及对某些字的缺笔；二是辨认各家的斋名别号，从而了解钞本的钞家和时代。

鉴别古籍版本的目的是为了品评优劣，求得善本。因此，黄丕烈在《题跋记》中对古籍善本的标准也作了论述。他认为“书以古刻为第一”^④，古刻当指宋元旧刻。宋元刻本之所以可贵，在于保存了原来书籍的面貌，是未被改窜的。对宋元旧刻，也要分别看待，他曾指出：“余向闻《柳文》以吴门郑氏本为最善。”^⑤这就是在善中求善，追寻最优秀的古籍善本。同时，他看到古刻中也存在劣本。他虽“佞宋”成癖，但并不认为宋刻本一切正确，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某些宋刻中的不足，“宋刻也

有讹脱处，所谓无心之错。”⑥卷二跋《后汉书》也说：“此外如建安刘原起刊于家塾敬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为宋，而实则不及元明刊本。何以明之，盖所从出本异也。”同是宋本，祖本与翻刻又大不相同，“宋刻本一翻雕而神气已失，不必在异代也。”⑦相反，不是宋元旧刻的初刻本则同样可贵，如卷二跋《长安志·长安志图》：“勿以明刻轻之，书之号称祖本者，此即是已。”所以，刻本之善否，不仅在于朝代，还要看是否祖本。

黄丕烈在《题跋记》中曰：“大凡书籍，安得有宋刻而读之，无宋刻则旧钞贵矣，旧钞而出名家所藏，则尤贵矣。”⑧可看出他对旧钞本的重视，宋元旧刻所存不多，很多书籍是靠传钞流传下来的。钞手的功夫精，误差少，则钞本的价值高。有些钞本是影钞本，这些影钞本是按宋元旧刻一笔一画描写下来，书籍的字迹、版式、图记都与原本毫无差失，其版本价值并不亚于古刻本。

他还很重视校本的作用，卷三《韩非子》跋中说：“书必真本为上，其次从真本手校乃可信，盖手校、真本止隔一层。”校本可以校正翻刻本的误失，通文字，正事实，与真本所去不远。

对于明孝宗以后盛行的铜板活字本，他评价说：“古书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也。”⑨铜活字本的出现，不仅是印刷史上的卓越成就，还由于其时近于宋元，宋刻、元刻所存尚多，可作依据，且当时为明代前期，明人擅改古书风气未起，所以铜活字本一般都较好地保留了古书原貌。

道藏是中国道教的经典，目录书收入子部。道藏中有些书刊行早，刻印精，错漏少，黄丕烈曾加以利用。他说：“世无宋元善本，道藏其先河也。”⑩利用道藏校对子书，他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和尝试。

（二）对校勘学的贡献

黄丕烈是有名的校勘学家，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国朝著述家姓名略》把他列入清校勘学家三十一人之中。他自二十七岁起开始抄书、校书，据《题跋记》所收三百余种书籍题跋来看，每一部书都经他亲手校勘，有的甚至复勘两三遍。他校勘认真，又多据善本，故他校勘的书籍历来为学术文化界所珍重。他的《题跋记》，也为后人留下了这方面的丰富成果和宝贵经验。

首先，《题跋记》在校勘的基础上，记录了对有关古籍的正误补阙。例如，卷五跋宋刻《孟浩然诗集》曰：“余取旧藏元刻刘须溪批点本手勘一过，知彼此善恶，奚啻霄壤。非特强分门类，不复合三卷原次序，且脱所不当脱，如《岁晚归南山作》，《新唐书》所云浩然自诵所有诗也，元刻在所缺诗中。衍所不当衍，如《岁除夜有怀》，明知《众妙集》中为崔涂诗也。”此跋校出元刻本的脱衍。又如卷六跋《文苑英华纂要》中，指出会通馆铜活字本的阙误说：“会通馆活字本即据缺失之本开雕，并削去第二十九叶首行‘初赋’二字，以当十六卷之首叶，苟非宋本，何从知其伪乎？”类似这些校勘，往往准确地订正了古籍的阙误，而使善本书、精校书更为完善。

古书有阙误，有时校订古书的著作也有错误。《列子》一书的注释有张湛注解、殷敬顺释文，后世刻书或将注解与释文相混。卢文弨《群书拾补》在校勘张湛注解时，也错认殷敬顺释文为注解，黄丕烈指出：“如‘贾逵姓氏英览’、‘用若十二故’二条，尚误认释文为注，坐藏书不多故也。而余幸藏有宋板矣……”^①因宋本刻印时只有张湛注解，尚无殷敬顺释文，所以他确有证据地校正了这个错误。

由于古书在流传中残缺，或被人删改，因此有些目录书作了错误的著录，这也是需要校正的。例如《新雕注解珞珞子三命消息赋》连附录为五卷，而焦竑《经籍志》著录十卷，并将注疏者东方明误为东方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缺载注疏人姓名。

黄丕烈以宋本校勘，跋曰：“标显李全注，东方明疏，可补晁《志》脱注人姓名及东方明之失，并正焦《志》‘朔’字之误，‘十’字之误。”^⑫对当时的目录学权威著作《四库提要》，他也作过补充。卷六跋《修辞鉴衡》记：“《四库》虽收，读其提要语，序文缺第一叶，以致始受书于王公之刘某不知其名，且云缺第五叶。今刘起宗之名固在……此本居然全本矣。”由于查出缺叶，而得知《四库提要》所说刘某名即刘起宗，补上了阙名。

其次，《题跋记》中探讨了古籍致误的规律。黄丕烈的校书虽说还不能对古书致误规律进行有意识的总结，但《题跋记》中对古书致误原因的寻绎分析，却提出了不少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现象。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字形近而误。古书因字形近造成错误者甚多，他曾叹曰：“……由此推之，书之字以形似而误者，可胜言哉！”^⑬

钞工删削之误。古时藏书家常请钞工钞录善本，有时钞工偷懒随意删削，致使古书内容缺佚，这就是《题跋记》所说，“钞胥惮烦，每割去大文长记”^⑭的情况。

装潢致误。卷四跋《湘山野录》记以宋刻校毛扆《津逮》本，“取对至卷中‘时○晏元献为翰林学士’一行前，竟脱落‘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十八字，初亦不解其故，反复展玩，乃知此十八字钞时脱落，后添写于旁，……而后来装潢时穿线过进，遂灭此一行。”

钞改之误。卷四跋《闻见后录》中记：“唯钞手不一……或本字写误，即改于误字下，其初写误字，又未经抹去，往往有不成文理者。”

修板挤行之误。卷六在跋明本《杨文懿公集》第十四叶曰：“余本首行为‘侯服一布’云云，当是修版挤行，故脱前行，今并取以补之。”

再者，《题跋记》还记录了黄丕烈校勘书籍的心得体会。他

的校书经验，很多是对后学有帮助的。例如他强调校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校勘，才能最后评判书籍的版本优劣。认为：“书非目睹，凭口说耳食以定是非，断断乎其不可。”^⑤“凡书不可不细校一通，第就其外而观之，谓某本胜某本，此非定论也。”^⑥他秉承和发扬自顾炎武以后清代学者反对妄改古书的风气，力主校勘古籍，要慎重其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吾于古书，亦守斯训尔。”^⑦这是他校书的一个重要原则。“书之难校，扫叶拂尘可谓至论。”^⑧这是他长期校书的深切体会。因此，他校书认真刻苦，“日座书斋以校雠为事，甚至心烦头胀，犹不辍手”。有的书不仅两遍、三遍地复校，还虚心请教他人。一旦发现自己校书的错误，便随时纠正，进行自我批评。对此，他称之为“自讼”，《题跋记》中“自讼”甚多。

校勘书籍，除正确态度外，更须具备有关的知识。比如熟练掌握古代汉字的音、形、义，打好“小学”基础，就容易判断正讹所在。他常以此告诫子孙后学，卷六跋《张来仪文集》中说：“古人云：欲读书必先识字。此小学之不可不讲也……即如《广韵》，小学书之一种也，而中有‘槐’字，注云‘读书床也’，人尽忽焉。义门（何焯）因得是集而读之，而校之，且几疑‘槐’之为‘幌’，而朱校‘木’旁作‘巾’旁。幸下文又有‘幌’字在，方悟‘槐’之非误，而举《广韵》注以证之，此义门之讲小学，慎校书也。儿曹其可弗知乎？”这都是说小学在校书工作中的重要。

他还一贯主张校书应当广蓄书。他自己就是广求异本，择善而从。卷四跋《归潜志》中说：“且书必备诸本，凡一本即有一本佳处。即如此，固多讹舛矣，而亦有一二处为他本所不及，故购者必置重沓之本也。”

以上都是《题跋记》在校勘学上的成绩，虽然是散见于各题跋中，未集中阐述，形成理论性、系统性的专著，但却对有关古

籍的版本、目录、文字、内容诸多方面进行了整理、疏通，为后人提供了阅读古书的有利条件。

（三）对目录学的贡献

《题跋记》不仅是有较高水平的版本目录学专著，也是旧刻精钞的善本书录。总观全书所录古籍三百多种，皆宋元明精刻及精钞，对著录的每种书籍，大都记载了它们本身的有关状况。

在对书籍作者的介绍中，《题跋记》的特点是注意记叙那些不甚知名的作者的生平，如卷三跋《史载之方》，为了弄清史载之的情况，题跋引用了《直斋书录解题》、《宋稗类钞》、《北窗灸录》等书内容，终于考证出作者的用名、郡里和事迹。

《题跋记》很重视反映古书的授受源流，有时为了记一书源流，遍查诸家书目，对书籍的流传变化、卷数分合、次第完缺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如卷二跋《编年通载》：“今得见宋刻藏本，足征古书授受源流，为之拍案叫绝。一卷数之可信，向传十五卷，闻《通志略》云十卷，此序云列为十卷，其可信者一。一收藏之可信，《文渊阁书目》载有二部，一十册，一五册。此第三卷有文渊阁印，其可信者二。一残缺之可信，十册、五册文渊阁，豪竹堂五册，所载如是；二册内阁、绛云楼、述古堂所载又如是；其装四册者，或十册、五册之有所失，二册之有所分，其第五卷以下皆阙，与《内阁藏书目录》合，其可信者三。”

有关古籍版本、版式、行格的记述，更是跋文的主要内容。例如《梦溪笔谈》当时流传有宋、元、明各种版本，黄丕烈详细介绍了这些本子的情况：“《笔谈》于宋人说部中最为赅备，故世尤珍之，然宋刻绝少，所见惟元刻小匡子本为最古，此外则皆黑口本（明本）为好本矣。黑口本亦有二：一阔板子，世以贗宋刻；一狭板子，此其是也。”^⑩卷四跋《论衡》记宋本详状曰：“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叶行款字形各异……。”缪荃孙曾评论黄丕烈的题跋为“跋一书而其书

之形状如在眼前”^②，可见黄跋的详确。

《题跋记》也常有对书籍内容的评介，这些评介往往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如曰：“《霏雪录》，明人说部之佳者。”^③

“《太平御览》为类书渊藪，近时讲究实学者尤重之。”^④语虽简短，却道出书籍的学术价值。

《题跋记》有关书籍状况的记录对后人读书、治学皆大有裨益；特别是其中所录书籍今已有散佚或残阙，学者更可赖此以考察古书的本来面目。

三

黄丕烈在追述书籍授受源流的同时，往往附记其购买、假借过程及某些藏书家的家藏等。因此，《题跋记》记载了大批藏书家的情况和书林史话，这些记载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风貌，也使我们对清代私家藏书的发展及一些藏书家的传略有所了解。

有关藏书家的姓名、印记等，书中就有许多记述，如卷六跋《藏春诗集》有：“莲泾，王姓，闻远其名，声弘其字，莲泾又其号也。有《孝慈堂书目》传世。娄东宋氏必宋定国宾王也，其人多宋元人集抄本，亦有名者。”这些是对藏书家姓名的介绍。

《题跋记》中记藏书家书斋名多至几十个，有些是人所罕知的。如何焯（语古）、柳如是（惠香阁）、顾之逵（小读书堆）、陈樽（西酌草堂）、杨梦羽（七桧山房、万卷楼）等人斋名室号的记录，皆可广异闻。

书中还随时记录藏书家的印记，如卷四跋《却扫编》时便记载了文徵明、徐乾学、季振宜、宋筠等大批图章。如何焯“茶仙”，文徵明“竺坞藏书”、“衡山草堂”等名号章、藏书章、书屋章，都有助于对藏书家与古籍的认识和考证。

黄丕烈对于当时的藏书家收藏情况多所了解，因而书中也对一些藏书家的收藏作了介绍，特别是对一些小名家，别的书记载

不多，年久则不易了解，这种介绍就更为有用。另外，书中还转引了毛晋、毛扆、钱曾、何焯、钱大昕、孙星衍、鲍廷博、顾广圻、宋宾王、陆西屏、陈鱣、吴騫、周春、潘耒等著名藏书家对书籍的题跋，也可供学习借鉴。

江浙是我国藏书家荟萃之地，《题跋记》在叙往事、述见闻、记交游之中，对藏书家、书贾的记载多达一百五十人左右，留下不少当时江浙藏书家的活动情况，这些材料多不见于史志、传记，故较为珍贵。

《题跋记》中还有关于书林史话的丰富记载。乾嘉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生产发展，文化事业日盛，黄丕烈以自己的身经目睹，记载了当时书业的种种变化。如卷四跋《芦浦笔记》《杨公笔录》中有关吴县书坊兴盛的状况；卷三跋《普济方》、卷五跋《三谢诗》中关于宋刻书以叶论价的记载以及抄书、装潢书籍的费用高昂，且拖延时日等等。这些内容可见当时风气。书中还叙述了苏州东城的藏书渊源，在庆贺清嘉庆帝寿诞的贡局上选购书籍，古人爱书惜书的训语等一些书林掌故。

四

《题跋记》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黄丕烈在古籍版本的辨别上，主要依赖对书籍各种表面形式的鉴定，而忽视了书籍本身内容对鉴别版本的重要作用，因此难免出错。例如卷六跋《丁鹤年集》，他就未能觉察其中作于明初的某些诗篇，而误把形似元刻的明刻本定为元刻本。有些跋文内容由于缺乏深入考辨，也出现了疏误，例如卷二跋《梁公九谏》，不知“赐书楼”是明代藏书家叶盛专门收藏御书的地方。卷五《北山小集》跋，又不知黄氏淮东书院主人黄琳，是当时金陵收藏家之代表者。至于卷二跋明道本《国语》一文，黄氏未加审核，竟将《国语·周语》“襄王二十四年秦师将袭郑”错录为“僖二十四年……”，犯了自己

时作针砭的大弊，这也是不应该的。

有的题跋则表现了作者的唯心主义观点。如在卷五跋《三谢诗》、跋《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等一些跋文中，他把书籍的聚散存佚都看成是鬼神造物的安排。

此外，在有些题跋中还过多地叙述家常琐事，抒发叹老嗟贫的情调，离开了评论书籍的主题。以上种种缺点的存在，成为该书之累，但是总的看来，《题跋记》的学术价值还是主要的，今天仍然值得借鉴和利用。

《题跋记》刊行时间较晚，但是由于该书的实际价值为士林所重，因此又有重刻翻印。今流传的各种版本有：光绪八年（1882）潘氏刻本，这是最早的刻本，已不多见。常见的是一函两册的石印缩影本。光绪十年（1884）滂喜斋刻本，此本与初刻略有不同。此外，还有以滂喜斋原版印刷的苏州振新书社印本；1917年以光绪十年滂喜斋本为底本影印的上海医学书局影印本及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现藏的缪荃孙手抄辑本。手抄辑本抄于光绪六年（1880），收题跋二百三十九篇，其中不见于刻本者三篇，刻本有此本无者一百零五篇，可见此本不是最后定本，但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注：

①见叶德辉序《求古居宋本书目》。

②卷五，《小畜集》跋（凡引自《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者，不注书名）。

③卷六，《东莱先生诗律武库》跋。④卷五，《浣花集》跋。

⑤卷五，《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跋。

⑥卷五，《孙可之文集》跋。⑦卷三，《新序》跋。

⑧卷五，《李群玉诗集》跋。⑨卷四，《开元天宝遗事》跋。

⑩卷四，《鹖冠子》跋。⑪卷四，《列子》跋。

⑫卷三，《新雕注解珞珈子三命消息赋》跋。

- ⑬⑭卷三,《砚笈》跋。 ⑮卷二,《东京梦华录》跋。
⑯卷三,《衍极》跋。 ⑰卷二,《中兴馆阁录·续录》跋。
⑱卷四,《刘子新论》跋。 ⑲卷四,《梦溪笔谈》跋。
⑳《蕙圃藏书题识》序。 ㉑卷四,《霏雪录》跋。
㉒卷四,《太平御览》跋。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 总目·目录门》问世

为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充分、方便地查阅利用普通古籍,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组正在编纂《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总目共分为目录门、经籍门、史乘门、地志门、传记门、古器物学门、社会科学门、哲学门、宗教门、文字学门、艺术门、自然科学门、应用科学门、总记门等十五个门类,其中第一卷“目录门”现已面世发行。其余十四个门类目录的编辑工作也在进行,并将陆续问世。

《目录门》由正文和索引两大部分组成。书目正文以1911年为界,分为上编和下编,分别分类排列。索引收录书目正文的全部书名和著者名称(包括异名、字号和子目书名、著者等),按书名、著者首字的四角号码排列,索引后附索引首字笔画检字表,正文前附目录类分类表,起到《目录》的目次作用。正文后附“普通古籍目录分类法(史部目录类)”,列出有关类名和简称,与书目正文每个大类后所附的四库类目简称对应。《总目·目录门》有以下特点:1.收书较多。《目录》共收书1892种,3678部,14947册。其中上编收书587种,1197部,7257册。另有书影30种,76部,291册。散页7种7部,2555幅。下编1305种,2481部,7690册。2.以1911年为界,将线装书区分为古籍和非古籍。为图书馆的采、编、藏、阅和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3.实施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为古籍编目的标准化、自动化和实现更大范围的古籍资源共享创造了条件。4.各项著录力求详尽、客观、细致、准确。5.增加了新的下位类,进一步完善了学科分类。6.提供了较多的检索途径,顺序号和索引出处著录深入到每个款目之内。

·寒冬虹·